作者郭素红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学，大概本文也颇有些清学的余韵，对义理不太重视或者说作者对义理的掌握有所不足，主要还是就经学本身的发展历程来论述。而且作者行文，在结构的安排上不太合理，既有文字的重复过多，也有条理不清、不易理解的地方。一些小瑕眦，如朱棣，在前一页称作太宗，后一页又变为了成祖，王守仁被追谥为“新建侯”而不是“新建伯”，这些问题虽然无关大碍，但对严谨的学术著作来说，确不应该。

作者写道：“由于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，灭人欲，强调从内心收敛欲望，把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等级秩序当作天理而自觉服从，正人之心术，止息邪说暴行，因此备受明朝统治者的青睐。”这便是对程朱理学极大的误会，但也不是没来由的，因为从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所发挥的影响来看，似乎确如作者描述的一般，朱子学是“维护现有秩序与统治者利益的保守意识形态”。正是在实践领域的这种现象，使得作者的表述，实际上成为了一般人以及部分学者眼中程朱理学的本来模样。但如果从理学的典籍中，如《朱子语类》，或是回到理学在宋代的诞生及发展来看，程朱理学显然不是为了什么“维护封建道德、封建等级秩序”，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说法也没有来得那么极端。理论开创者本人的思想，和在历史流衍中后人对理论的具体理解乃至应用，并不能等同，不然，我们也要不能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了。

其实作者也给出了生动的证据，是自己观点的反例，即朱元璋令刘三吾撰订《孟子节文》，删去大量不利君主专制的言论，就是赤裸裸地对程朱理学思想的歪曲，我们便不能说明代的程朱学表达的便完全是二程、朱熹的本意。但这里也有个程度大小的问题没有得到作者的讨论，《孟子节文》类似的删订本对明代学人产生了多大影响，学人是否有可能获取完整的《孟子》，等等（补订：目前笔者看到有材料说，《孟子》的全文已在1414年恢复，见《历史上的理学》，p129）。相似的问题也及于作者短暂提到的禁书上。不过就目前笔者所看到的研究来说，似乎学者们一般都认为科举对学术风气的影响上尤为大，还要胜过其他的因素。

阳明学在明中后期影响甚大，内阁大臣信众亦不鲜，则阳明学为学子所争相学习效仿，进入科举算是正常。但若说阳明学在社会上和学林中彻底取代朱熹经学，则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证据。目前可得到的重要信息有二，一是朱子学的地位在明代并不与政府之权威相牢牢绑定，如新约之于天主教会，马克思之于共产党。二是揭示时代风气之变化，如果延续明末趋势，令学界自然发展，则朱子学之崩溃必是明显之事，阳明学虽建设性不足，但对程朱学地位之破坏，已立其功。惟清廷复又搬出朱子学来钳制天下之思想，则是对学术之极大阻碍，生生截断原本的发展。

作者指出明代中后期部分学者对宋学的检讨，虽是伏流，却为后来清代大盛的“朴学”的先导，此固然不错。但作者对清代学者“宋学游谈无根”的评价也表示认同，实在太不应该，这就又陷入了清考据学那种只顾训诂不顾义理的偏仄境界。